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3月4日，来自河南的骑行队在小岗村游览，队员年龄大多在60岁到70岁之间。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磊/摄

农村土地改革 从分到合的成功密码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雷宇

当杨小运开着私家车在车水马龙的城市娴熟穿行，40年前收获人生第一辆自行车的记忆，仍不时涌到眼前。1979年，面对吃不上饱饭的困难局面，湖北应城杨河公社六房生产队队长杨小运把全队分成3个生产组，再将田分到组。1980年夏收，生产队一下子就完成了全年粮食定购任务。1981年8月，在完成国家征购粮任务外，24岁的杨小运将超产的5000多公斤粮食卖给国家。当应城县委办的翟姓科长下乡调研，问他有什么要求时，杨小运摸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我想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在当时是公认的家庭三大件之一。随后当地媒体一条《种粮状元超售万斤粮 只想买辆自行车》的短消息，让他成了新时代农民典型。他当选为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成教班毕业后从一个农民一步步成长为应城市农委副主任，为全市数十万亩农田从分田到户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而操心。如今，杨小运的自行车被存放在应城市档案馆最显眼的地方，他超卖万斤粮食的发票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位农村土地改革四十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说，自己是撞了时代的大运。这背后，亿万中国农民随时代大潮奔涌向前。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土地，每一次农村改革都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始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教授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他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1978年，作为开启农村土地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为了吃上一顿饱饭，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干到户的生死状上摁下红手印。小岗村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之开启，彻底打破了以生产队及生产大队为单位的“大锅饭”体制，奏响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部曲。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亿万农民在焕发粮食生产积极性，中国农村迅速由“贫困饥饿”到“温饱有余”。1984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粮食过剩，1985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农村消费占全国绝对比重的态势，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邓大才教授分析，这个阶段是针对当时集体经济“统得过死”作出的反应。这一分，农产品从短缺到极大丰富，一下子就把农村搞活了。第二个阶段是“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打工潮的出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走向

城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农户承包地使用权可以自愿、有偿流转。原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既有承包又有责任，这个阶段，土地开始流转，活起来，是工业化城市化必然的结果。第三个阶段是“合”。2005年，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结束了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免除农业税，实际上免的是土地税，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大量人口离开农村，原来家家户户种地的农民出现分化，承包农户不经营自己承包地情况越来越多，“合”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指出，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土地规模开始集中整合，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目前我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以百万计，新型职业农民达到千万量级。土地性质从此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生存的工具，变成了生产要素，传统的农村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邓大才教授说，他对此解读，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出现了三次大的调整，第一阶段是赋予了农民承包权；第二阶段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了；第三阶段，明确提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三次调整，解放了农民，搞活了土地，释放了资本跟土地结合的空间。邓大才教授认为，整体上看我国四十年的土地改革，既没有像西方完全个人化私有化，也没有像苏联一样纯粹的大一统的集体化，兼具了集体和个体的优点。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设计，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回望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四十年，成功背后的规律是什么？邓大才教授的答案是：视野放长远一点来看，中国所有能取得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缘起于底层动力的推动，政府之手如何舞动，最核心的就是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和基层的创新精神，尊重市场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今天，谁来养活中国的崩溃论早已被打破，中华民族已经远离饥饿的恐惧，亿万农民开始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图景。前不久，邓大才教授到江西省彭泽县调研，这里农村土地改革带来的新景象让他眼前一亮。从2015年开始，短短5年时间，当地3个乡镇，29个村通过土地流转整合，搞成了一个15万亩的稻虾养殖基地，创造了一个60亿产值的龙头企业。所以他们的市委书记表扬，是无中生有，遍地开花。乡村振兴还是要打地的主意。在他看来，农村土地问题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让老百姓从填饱肚子到鼓起腰包，要通过土地的要素化、市场化、集约化和资本化，才能把土地搞活。邓大才教授介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全国有数十个调研基地，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百村观察。从我们调查过的地方来看，凡是“四化”搞得好的地方，都有钱了，都发展起来了；凡是搞得不好的地方，就发展不起来。

从18个红手印到一句520 小岗村：没有躺在历史功劳簿上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磊

乡村振兴，关键看人气。没出正月，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就早早地告别假日的状态，洒水扫路，端出新鲜的草莓，一切就绪，喜迎八方来客。58岁的丁雯从新疆阿克苏来，这是她第二次来到小岗村，对比两年前所见的村容村貌，她不禁感慨：又变了，好多地方已经不认识了。远处，几台工程机械车辆正在施工，再过一段时间，小岗村的外环路就会畅通起来，更加方便节假日游客的出行，助力5A级景区创建。要知道，该村曾经在2019年5月1日当天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直逼黄山风景区。

作为一名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丁雯这次回到蚌埠探亲，特意带上家人重访附近的小岗村。在她看来，小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眼下学习党史就要好好温习“大包干”这一课，让全家人都来实地感受小岗村的历史巨变。年轻导游吴静一天的工作，是从万里同志题写馆名的大包干纪念馆开始的。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现在“三红村”，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土地确权颁证的红簿子，再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利，群众过上了红红火火的生活。出于经验，每当此时，吴静会稍做停顿，等待参观者的提问。你是小岗人吗？拿到分红了吗？她习惯了用略显平静的语气回答：我是土生土长的小岗人，连续4年有分红，就连我5岁的孩子也有！

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不过，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面对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有的地方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率先进行改革试验。1978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秋种遇到严重困难。安徽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菜，所产蔬菜不征购，不记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出现了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景象。借地，无疑唤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他们头脑里一直被压抑的“单干”念头重新冒了出来。1978年12月的一个沉沉寒夜，村民严立华的煤油灯散发着希望之光。关友江、严俊昌、严宏昌、严金昌等18户村民在此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这一年，严金昌刚刚30岁出头，大部分人年纪相仿，这群敢为天下先的农村青年，就这样吼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惊雷”。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13.3万斤，人均收入400元，20多年吃救济的历史戛然而止。大包干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渐确立，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为全面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借地，无疑唤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他们头脑里一直被压抑的“单干”念头重新冒了出来。1978年12月的一个沉沉寒夜，村民严立华的煤油灯散发着希望之光。关友江、严俊昌、严宏昌、严金昌等18户村民在此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这一年，严金昌刚刚30岁出头，大部分人年纪相仿，这群敢为天下先的农村青年，就这样吼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惊雷”。



创业青年陈敬萍用20亩流转土地，建起了草莓大棚。3月4日，她在自家大棚里向来采访的游客介绍草莓品种。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磊/摄

设，让小田变大田，更加有利于连片机械化操作。一批返乡创业青年因地制宜组建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带着村民共同致富。1979年出生的殷玉荣曾经在外跑运输，返乡后办起了养猪场，获评小岗村致富带头人。富起来的殷玉荣看到村里土地闲置的现象，萌生了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念头。小岗村民组43户村民以584.81亩土地经营权入股，加入殷玉荣牵头成立的民益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农户可获得“三金一补”收益。

过去外人常说小岗发展不足，今天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为核心，全域旅游、培训教育、农村电子商务为补充的“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在这里基本形成。李锦柱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小岗村2021年乡村振兴工作安排，其中细化到68项具体任务，每一项都对应着凤阳县和小岗村的具体单位，全年发展方向与具体路径一目了然。

只有业态丰富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才能更宽广。在李锦柱看来，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把人气提起来，让村民人人参与经营，个个有赚头。如今在小岗村，春天草莓节、夏天葡萄节、元宵夜市，各种节庆活动轮番上演，政府搭台，百姓唱戏，农家乐家家爆满，村民家的土特产被外来游客抢购一空。

李锦柱至今记得，有一年葡萄节，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家的农家乐，一个中午接待了43桌。关友江的老伴笑着对我说，你们怎么一下子弄来这么多人，鸡被吃完了，鸡蛋也炒完了！

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所有人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实现共同富裕。随着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的不断深入，村民从昔日的“户户包田”转变为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2020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再创新高，达到了1160万元。自2018年起，小岗村连续4年分红，村民人均分红金额从350元、520元、580元增加到600元。

在李锦柱看来，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把人气提起来，让村民人人参与经营，个个有赚头。如今在小岗村，春天草莓节、夏天葡萄节、元宵夜市，各种节庆活动轮番上演，政府搭台，百姓唱戏，农家乐家家爆满，村民家的土特产被外来游客抢购一空。

李锦柱至今记得，有一年葡萄节，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家的农家乐，一个中午接待了43桌。关友江的老伴笑着对我说，你们怎么一下子弄来这么多人，鸡被吃完了，鸡蛋也炒完了！

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所有人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实现共同富裕。随着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的不断深入，村民从昔日的“户户包田”转变为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2020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再创新高，达到了1160万元。自2018年起，小岗村连续4年分红，村民人均分红金额从350元、520元、580元增加到600元。

在李锦柱看来，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把人气提起来，让村民人人参与经营，个个有赚头。如今在小岗村，春天草莓节、夏天葡萄节、元宵夜市，各种节庆活动轮番上演，政府搭台，百姓唱戏，农家乐家家爆满，村民家的土特产被外来游客抢购一空。

李锦柱至今记得，有一年葡萄节，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家的农家乐，一个中午接待了43桌。关友江的老伴笑着对我说，你们怎么一下子弄来这么多人，鸡被吃完了，鸡蛋也炒完了！

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所有人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实现共同富裕。随着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的不断深入，村民从昔日的“户户包田”转变为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2020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再创新高，达到了1160万元。自2018年起，小岗村连续4年分红，村民人均分红金额从350元、520元、580元增加到600元。

18个红手印开启农村改革序幕

民以食为天，那段艰难的岁月，粮食“饥饿”两词深深刻进小岗人的集体记忆中。大包干纪念馆的起展处，便是一幅粮食产量表：100多人的小岗村，1966年-1976年间，粮食产量始终徘徊在3万斤左右，触目惊心的是，1966年人均口粮仅有110斤。村民长期吃供应粮，1975年整整吃了10个月。

种地的，不能养活自己，还要靠国家来救济，脸上无光呀！78岁的严金昌回忆，一天几顿稀饭，没见过干饭的影子，最盼着春天，可以挖野菜充饥。

在生存和尊严面前，小岗人只能无奈地舍弃后者，别上一副“风阳花鼓”，外出讨生活。如果有一线生机，都不想出门要饭。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今年78岁，仪表堂堂、身板挺直。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头一回讨饭，实在不好意思走到人家门口，有好心人会倒上一碗稀饭，不在饭桌上，人家会给一小把米，我就紧紧攥在口袋里，生怕丢了一颗。

报告文学作家温跃渊回忆，严金昌家当时屋前还有两三分地，他把种的生姜弄到淮北去换山芋干，一次在固镇县换了128斤山芋干，往家挑，挑不动了，就数着电线杆子挪脚步。即使这样的讨饭户，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割到他头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深刻指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

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不过，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面对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有的地方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率先进行改革试验。1978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秋种遇到严重困难。安徽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菜，所产蔬菜不征购，不记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出现了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景象。借地，无疑唤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他们头脑里一直被压抑的“单干”念头重新冒了出来。1978年12月的一个沉沉寒夜，村民严立华的煤油灯散发着希望之光。关友江、严俊昌、严宏昌、严金昌等18户村民在此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这一年，严金昌刚刚30岁出头，大部分人年纪相仿，这群敢为天下先的农村青年，就这样吼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惊雷”。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13.3万斤，人均收入400元，20多年吃救济的历史戛然而止。大包干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渐确立，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为全面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借地，无疑唤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他们头脑里一直被压抑的“单干”念头重新冒了出来。1978年12月的一个沉沉寒夜，村民严立华的煤油灯散发着希望之光。关友江、严俊昌、严宏昌、严金昌等18户村民在此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这一年，严金昌刚刚30岁出头，大部分人年纪相仿，这群敢为天下先的农村青年，就这样吼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惊雷”。

借地，无疑唤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他们头脑里一直被压抑的“单干”念头重新冒了出来。1978年12月的一个沉沉寒夜，村民严立华的煤油灯散发着希望之光。关友江、严俊昌、严宏昌、严金昌等18户村民在此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这一年，严金昌刚刚30岁出头，大部分人年纪相仿，这群敢为天下先的农村青年，就这样吼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惊雷”。

责任编辑 / 李新玲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图片编辑 / 陈剑 美术编辑 / 李晗

